# “清朝与早期美国，1784—1844年东海岸中部地区对华贸易文件”学术讨论会论文述评

（美）乔纳森·高斯坦著　吴建雍译

这里考察的所有档案都多少与中美贸易有关，它们对从不同地区或国家的角度、以不同的理论观点研究贸易的史学家，都可能是有用的。鲁宾斯坦教授在约纽历史学会和公共图书馆查索的档案，将会首先引起中、美经济史学者的兴趣；约纽图书馆和联合神学院的资料，则主要对研究传教士及其与商界关系的历史学者有用。戴维斯博士介绍了有关经济、外交和艺术史方面的档案。唐斯教授翻阅了有关凯莱布·顾盛的文件，研究外交、法律、商业的史学家会很感兴趣。他还查阅了约翰·理查森·拉蒂默的文件。其中有关于商业问题的，诸如本杰明·丘·威尔科克斯如何最早开始并扩张了美国从土耳其和印度向中国输入鸦片的活动。拉蒂默文件中，还包括有一套水墨画，详细刻画了中国制造的妇女用梳子进口美国的情景。这样的美术品，对于研究早期美国的艺术、风尚和物质文化的学者，以及纯经济史学者，都是重要的资料。

我将分别论述这些档案对经济史、外交史、艺术史和传教史研究者的用处。我选择从经济史开始，是因为这次学术会重点讨论有关商业的文件；还因为，如唐斯教授在十年前提交美国历史学会的一篇论文中所指出的那样：中美贸易是两国间最初的联系，而中美外交、传教活动乃至美国风尚的一些趋向，都最终派生于这一联系。

## 档案对经济、商业、海运史学者的用处

关于贸易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清朝卷入世界经济对中国十九世纪经济的影响程度。郝应平（音译）在其两部主要著作中，以及罗伯特·P·加德拉、莉莲·M·李，都认为对外贸易具有重要的经济作用，特别是在中国的沿海地区。相反，威廉·罗认为，中国经济直到1889年，尤其是象汉口这样的内地，始终是按照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内在逻辑支配的进程演变着。他提到的所有商业变化，几乎都可以解释为与西方的到来无关。究竟孰是孰非？

这一问题又演变为确定中国经济组成部分及揭示每个地区与世界市场怎样相互作用抑或互不影响的问题。美国人之间的往来文件谈到哪些中国经济问题呢？唐斯和鲁宾斯坦教授提到中国沿海地区的一些大企业家：诸如拉塞尔、欧德、奥立芬、邓恩、拉蒂默、安米登、威尔科克斯、洛、霍平、顾盛和卡林顿。有关这些商业巨擘的档案，特别是他们留下的帐簿，将有助于说明“真正的”商业影响。在汉口及武汉其它地区出现的经济发展模式，截然不同于同一时期的广州及其近海地区。

进一步阐明外贸在十九世纪中国经济中的作用，有赖于对鸦片贸易影响的认识。有关鸦片贸易的大部分学术考察，包括唐斯教授的另辟蹊径之作，都主要着眼于国际商业和外交。但是，鸦片在中国经济中起何作用呢？乔纳林·斯彭斯在1975年的一篇文章中，探讨走私鸦片的地方经济组织。诸如广州商人、代理行、钱商、印度祆教徒商行这些特殊利益集团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关于这些集团，我们已有一般性知识；但是，如能获得更多的准确史料，将

十分有益。鸦片贸易怎样与中国的税制相适应？显然，在地方上，鸦片可以代替钱，由清朝后期开始进行征税。在商业利益对道德的胜利中，在中国自强计划的财政问题上，在旧式农业理想的崩溃中，在罪恶与外国人联为一体上，在皇帝做为臣民之父的保护者形象的最终破灭中，鸦片贸易究竟起了怎样的作用？尽管斯彭斯在1975年提出了上述所有问题．然而，直到1988年，鸦片仍然是十九世纪中美关系史中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唐斯和鲁宾斯坦查阅的商业档案，特别是拉蒂默和拉塞尔文件，可以帮助我们更多地了解鸦片贸易，并了解对外贸易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

唐斯和鲁宾斯坦论述的档案还与美国史研究有关。鲁宾斯坦称这些文件提供了亲身参与者对中国贸易的观点。这样的文件使我们不仅能知道美国商人遵循的贸易程序，并能了解到一般商人、船长和海员的生活状况。这种社会史观察角度，同马库斯·雷迪克、杰西·勒米施研究美国商人海员的行为及心态的方法，同出一辙。显然，有许多传记需要去作。唐斯教授在说明对华贸易中哪些人的传记能够、并且应该依据档案材料来写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他特别提出撰写本杰明·丘·威尔科克斯和塞缪尔·拉塞尔传记的必要性。

档案对外交史研究者的用处

除了对商业史学者有用外，唐斯教授查阅的凯莱布·顾盛文件，也是早期中美外交接触的主要史料来源。直到最近几年，1844年前后的中美外交史研究，主要是文物工作者和航海史爱好者的领域。从事这一课题写作的主要有西德尼和马乔里·格林比，他们于1925年出版了具有浪漫色彩的《俄斐之金》。泰勒·丹尼特的《美国人在东亚》，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写成的优秀的商业史著作，试图揭示美国与其他列强，特别是欧洲列强，在建立稳定的、和平的东亚秩序中进行合作的必要性。丹尼特的史著排除了亚洲观点，也不包括非官方的来往。1983年，迈克尔·亨特的《特殊关系的形成：截至1919年的美国与中国》，详尽阐述了丹尼特首先提出的问题，但做了不同的解释。亨特认为，外交谈判只是“中美特殊关系”这件巨大织物的一条线。它的基质，是由中国和美国众多不同人物，从无名的横跨太平洋的旅行者到社会知名人物精心创造的。到二十世纪初，他们把两个从文化和地理上都相距甚远的国家，结合进一种广泛的、复杂的和不稳定的关系中。

顾盛档案是典型的例证，说明这些文件有助于解释中美多面关系。显然，顾盛认为他自己不仅只是一个外交家、语言学家、律师或通商的拥护者，他还是一个公认的对华贸易界的坚定朋友。他的亲属约翰·P·顾盛是珀金斯商行代理人。当凯莱布（顾盛）力图为美国人在中国市场上得到与英国人同等的商业地位时，他还想到要超过这个大西洋彼岸的竞争者。顾盛在东亚事务中为美国优势辩护，将自己视为这一政策的推动者。此外，根据唐斯教授告诉我们的有关他对种族的态度，他可能还是一个白种优越论者。做为特使的顾盛，认为自已是从一个正在兴起的世界文明中心被派往一个曾经充满活力、但现在已经停滞的亚洲。文件中载有他的辛辣评论：“我们已经成为我们老师的老师”。详尽研究他的文件，可以更多地揭示他对其使命理解的复杂性。

档案对艺术史、物质文化史学者的用处

让我们从外交史的考察转入与对华贸易有关的艺术史。戴维斯博士介绍了一类特殊的对华贸易文件：1784年到1844年，从中国开往费城的美国商船货物清单和关税记录。她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运用这些资料可以做些什么研究的实证。戴维斯博士详尽阐述了艺术史学者卡尔·克罗斯曼的估计：十九世纪初，波士顿或塞勒姆，这两座城市住宅内的财物有十分之一

到五分之一来自中国。在她所研究的费城地区，依据关税档案材料，戴维斯博士列表说明，有三十三种中国商品是为公开市场进口的。她将那些一般性商品与定购的家具、纺织品、瓷器、金属制造品、美术品等区别开来，从而把中等阶级的购买物与较富有的上等阶级或较贫困的下等阶级的购买物区分开。她计算了中等阶级进口商品的花费，得出结论：设计精细、雅致的中国商品，对于美国中等或上中等阶级来说，是购置不起的。

戴维斯博士的论文，提出的问题既广泛又具体，诸如进口货的价格波动、中国贸易中商品的包装方法、集装箱货等。她认为下面的一些问题很值得研究：哪种类型的中国商品受到美国下层人民的欢迎，而中产阶级和上流社会又喜欢哪些商品？哪类承销人喜欢哪种货物？如何将费城在十余年间对中国货的进口，与纽约、波士顿、查尔斯顿的进口做一对比？“公开市场”上的中国货有多少是从欧洲和西印度向美国再出口的？这些转口货物与费城直接从中国进口的货物相比，占有多大量？中国商品在沿海贸易中所占比例如何？商船的吨位与其选购的货物有无内在关系？在一个期间，广州——费城每次航行所需时间不同，原因何在？戴维斯博士还介绍了其他一些同类文件，特别是美国国务院领事档案，以及广州的定期刊物，这些文件对研究对华贸易问题的学者会有很大的帮助。

## 传教士档案与旧中国贸易

最后，我们从对华贸易的艺术和物质文化方面，转入美国耶稣教传教士与贸易的关系问题。鲁宾斯坦教授的论文认为，传教士档案的用处远超过宗教史领域。这些档案犹如透镜，通过它可以观察到在中国、以及在复杂的中西关系中发生的新事情。传教士个人的、或集体的经历、回忆录、目睹记，可以使我们从不同的角度了解在广州的美国和欧洲商人。鲁宾斯坦教授问道：传教士如何看待与他们一同到达中国，并以他们为牧师和精神顾问的商人，在中美关系中这两类主要人物如何相互影响？例如，他们是在为推进相同的帝国主义而并肩工作，还是有不同的帝国主义做为各自的目标？鲁宾斯坦提出的这些问题是很有意义的，因为从非商界资料中获得的对从事对华贸易的商人的评价，可以丰富我们仅仅依据商业或外交文件形成的观点。鲁宾斯坦没有回答他提出的问题，我们期待着这位多产学者在他今后发表的著作中予以回答。

## 结　　语

在我结束这篇文章的时候，要提到在中美关系研究领域中的另一位主要人士。我要感谢并向弗兰克·约瑟夫·舒尔曼表示祝贺，因为他在亚洲学会东部海岸地区协会组织了年会。这次在东部海岸地区召开的有关东亚的档案和图书馆资源的讨论会，是弗兰克组织的第十二次年会。这次讨论会的三篇综合性论文，如同弗兰克以前组织的讨论会的很多论文一样，将会很快提供给学术界广大学者。除了在专门刊物上发表这些论文，我希望东部海岸协会的领导者最好仿照亚洲学会东南部协会1985年的做法，出版多卷本的提交地区会议的评介书目论文集。这里，我们要再次感谢弗兰克·舒尔曼。正如编辑肯尼斯·W·伯杰在东南地区一本论文集的序言中所说，“1982年，受弗兰克·约瑟夫·舒尔曼为亚洲学会东部海岸地区协会组织年会的启发，亚洲学会东南地区协会也开始举行档案研讨会”。还要补充一点个人的看法，我认为：在西佐治亚大学和其他地方，美国大陆或海外，文献和学术研究的很多进展，与弗兰克的慷慨、推动及不懈努力有直接关系。

（高斯坦曾著有《费城与中国的贸易，1682—1846》。他在这篇文章中介绍的有关清代中美贸易的档案材料和研究动态，仅供参考）。